

第五章 天安門事件 (1987-1989)

經歷了一波接一波，全國性的學潮之後，在 1987 年，鄧小平將胡耀邦換下。胡耀邦下台後，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記取教訓，企圖建立起改革的理論基礎，在政治上提出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作為和保守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依據。

但自由化失控的情形已經產生，兩年之後，中共還是得面臨 Przeworski 所說鎮壓或往民主過渡的抉擇，中國大陸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而在黨內改革、保守派實力比較，保守勢力高於改革實力，主因是因為鄧小平在處理民運立場站到保守勢力那邊；以及政權與民間社會力量相較，政權的能力跟以前相較雖有弱化，但政權力量仍遠高於民間社會的力量。

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失敗，威權體制重新鞏固，自毛死後所開始一波的自由化運動宣告中止。

第一節 派系概況及衝突點

鄧小平仍居於派系共主的地位，無論保守派、改革派或老幹部都遵奉鄧小平的領導。即使在面對天安門事件的此種可能導致共產黨崩潰的危機時，除少數個人如趙紫陽，大多仍遵從鄧小平的指示，即使是趙紫陽，也僅僅是不同意鄧的命令而辭職下台，但也沒有更進一步的實際作為，例如串連軍方不同意戒嚴的將領。

改革派大將胡耀邦由於 1986 年學潮，被王震、薄一波及保守派認為在「反自由化」工作不力，最重要的，鄧小平也持相同看法，因此下台。改革派在意識型態敗退，保守派意圖趁勢，藉此影響並扭轉經濟改革的速度，但由於鄧小平的支持，改革派才得在經濟領域上持續保有權力，鄧小平對經濟改革的堅持本文已強調許多次，1987 年 4 月 30 日，當時正是保守派氣燄正盛的時候，大肆地批判

「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在會見外賓時說：「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¹「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危及中國的經濟改革。」¹使得反自由化不會擴大到經濟領域。

改革派在經濟領域受到鄧小平的支持，但在 1988 年中第二次闖物價關失敗後，造成銀行擠兌與民間搶購物資的亂象，鄧小平也只能暫時倒向保守派較穩定的經濟發展策略。

但鄧小平沒有因此怪罪到趙紫陽等改革派，也沒有因此放棄改革開放，只是在經濟發展上換一個策略，待渡過需調整的時期後，鄧會再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從我們事後的觀察，1988 闖物價關失敗，造成劇烈的經濟亂象，1989 年又有天安門事件，但當經濟恢復穩定後，在 1992 年鄧又有南巡講話，並講了「誰不支持改革誰就下台」的重話。

而 1988 年經濟亂象加劇後，民心浮動，加上對共產黨幹部腐化的不滿，以胡耀邦去世作為導火線，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一開始中共沒有警覺到事態的嚴重性，無論保守派或改革派都認為只要讓民眾出出氣就好了，但沒想到由於共產黨在這兩年的施政造成的民怨太深，一發不可收拾，學生以「反官倒、反腐敗」為訴求，得到民眾廣泛的響應，進而「要民主」，而在運動中又出現了「打倒共產黨」、「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標語，自然讓經歷過文革的老幹部和鄧小平感覺不舒服。

在讓年輕一輩的領導人處理一陣後，情況不見好轉，鄧小平及老幹部憂心忡忡，鄧小平親自定性這是一場動亂，並要求以強硬手段來處理。改革派認為應用疏導的方式處理，但保守派則同意鄧小平與老幹部的看法，應該用強硬手段來處理，本文認為保守派有兩個因素做此決策：(1)意識型態方面，保守派原本就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嚴重，趁此機會剛好可解決這問題；(2)權力因素，鄧小平和老幹部很明顯地表態，保守派沒有不主張強硬手段的理由，更何況若事後

¹ 香港文匯報，1987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當趙紫陽被整肅後，保守派勢力必可大增。因此保守派見機即建議用強硬手段結束學運，並將之前處理不當的過錯，全部推給趙紫陽承受。

趙紫陽和鄧小平及保守派真正的絕裂點在 5 月 17 日，當天在鄧小平家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有鄧小平、楊尚昆、薄一波、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參加。在會議中趙紫陽遭受包括來自鄧小平的責難，認為趙紫陽應負全責，處理學運處理的不好，會中鄧小平並提議了戒嚴，趙紫陽表示他執行起來有困難，胡啓立則是認為戒嚴無益於問題的解決，但戒嚴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²尤其這是鄧小平的決定，自此改革派已註定失權。

值得注意的是老幹部，自中共推動幹部四化後，老幹部逐漸歸隱山林，或擔任閒缺，或是被延覽自中顧委，表面看起來影響力應是與日俱減的，但中國人論資排輩的傳統之下，老幹部仍然具有與其職位不對等相當大的影響力，例如 1987 年胡耀邦下台，王震和薄一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天安門事件中的重要決策，如趙紫陽下台、戒嚴的發布、江澤民的上台，鄧小平都有和老幹部們討論之後再進行決策，可見所謂非正式政治在中國大陸仍是居於主導的地位。

另外，除了上述派系外，也有些無特定派系的官僚型幹部，以大局為重，遵照黨中央的指示，例如萬里、喬石、李瑞環……等，當時都沒有具體的作為。

²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年)，頁 440-452。

表五之一 十三大後鄧小平與中共派系及其主張

	鄧小平	保守派	改革派	老幹部
代表人物	鄧小平	李鵬 姚依林 江澤民 袁木	趙紫陽 胡啓立 閻明復	陳雲 王震 彭真 薄一波 李先念 楊尚昆
經濟政策	支持「闖物價關」，失敗後支持保守派的「治理整頓」。	市場化改革過於激進，推行「治理整頓」政策。	應該要繼續地深化市場化改革。	沒有太多意見。
對於民運看法	四二六社論由鄧主導，定性為「動亂」。	學生公開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四項堅持，是非法的。	學生是愛國的，擁護民主和反對腐敗的主張和共產黨相同。	任憑局勢發展下去將亡黨亡國，學運勾起文革的回憶。
如何處理民運	鎮壓。	鎮壓。	疏導。	鎮壓。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 1：老幹部中的聶榮臻與徐向前較支持溫和作法，不贊成以鎮壓手段處理民運。但為老幹部中的非主流意見，因此兩人沒有列入本表。

註 2：本表將鄧小平的主張列入，以方便和其他派系作比較。

第二節 經濟危機：社經亂象的加劇

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接任總書記的第一件事，就是將保守派的氣燄澆熄，以免保守派干預經濟改革，在獲得鄧小平的支持，約在 1987 年上半年就將反資產自由化運動擱置，繼續地展開了一連串的經改措施。尤其在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基礎，決定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發展生產力是當前要務。

在 1988 年最重要的經改措施是從 5 月開始第二次「闖物價關」，放開城市農產品和煙酒的價格。在 1984 年開始第一波城市經濟改革以來，改革派就已經認識到價格改革是市場化核心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第一次「闖物價關」的失敗，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發人心浮動，社會失序，因此物價改革就暫時擱置下來。到了 1988 年物價改革的呼聲再起，認為理順價格，一方面能優化資源配置，一方面減少政府的價格補貼和財政負擔；認為 1986 年以來的「所有制改革」與「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專注於企業內部的改革，而忽略了經濟改革必須創造一個健康的外在環境，價格改革是不能延宕的。

由於 1987 年改革派在十三大鞏固權力，中國大陸的經濟在 1987 年受到鼓舞，加上經濟改革的多項措施，已經恢復高速成長。和第一次「闖價位關」的情形一樣，1988 年的物價改革又是在經濟過熱的狀況下實施，加速了通貨膨脹的程度，造成了民眾前往銀行擠兌以及搶購物資的情形。激進的經改措施再次遭到保守派批判。³

另外，民間消費過熱也帶動了通貨膨脹，中共認為消費工業易發展，所以刺激人民高消費以帶動發展，但其基礎工業和水電設施不足，反而造成生產能力遠落消費需求之後，陷入商品不斷缺貨的惡性循環，助長了通貨膨脹。

但真正造成共產黨統治危機的原因，是中共幹部的貪污腐化越來越嚴重，公

³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1996)，頁 83。

家機關和企業幹部常用公款去豪華酒樓吃遍山珍海味，甚至在餐後跟餐廳買洋酒，大家帶一瓶回家，當然還是報公帳，或是請親戚朋友吃飯，也是報公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被改爲「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另外，行政機關編預算時，一定先編座車的經費，官員、共黨高幹都非賓士不坐。⁴

另外，「官倒」現象最爲民衆不滿，官倒現象在 1987、1988 年最爲嚴重，變本加厲。所謂「倒」，就是在當時存在的計劃分配渠道和市場流通渠道之間買賣商品，賺取利潤。由於雙軌制的價格制度，除了按供求關係調整的市場價格外，有些重要物資，會用特定的、低於市場價格提供給指定企業，稱爲計劃供應。同一種物資，市場與計劃之間的差價十分大。於是有政府部門或掌權的官員利用他們可以調撥物資的行政權力，占有計劃物資轉到市場高價出售，從中獲利，稱之爲「官倒」。又例如在鋼鐵原材料供應短缺時，拿到一定數量的剛鐵材料供應的「批件」，僅是轉手而不需要真正去取得或出售，就可以獲利，而此時罷部份物資因爲國家供應不充分，賣批件成爲簡單可獲得暴利的事。⁵

一些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夜之間「換個牌、放個炮、剪個彩」，就成立了公司經商。這樣的公司在 1988 年推估有四十萬家之多，這些公司多不是生產型的，而只是從事物資轉賣，對社會生產完全沒有實益。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手握實權的在職領導幹部，往往一個電話、一張條子就可以搞到當時短缺的物資，進行倒買倒賣。

另外有些是離退休幹部，利用其身份發揮剩餘價值。他們雖然已退休，但關係、人情都還在，也成立公司進行倒賣；所謂的「子弟公司」也是如此，幹部子弟靠其父母的關係，也可弄到物資來倒賣。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的「康華發展公司」正是其中之一，醜聞不斷，在學運中常有「殺康華以謝天下」的言論，學運遭鎮壓後，中共還是決定撤銷康華公司，並予以懲處，以平撫民怨。⁶國營企業、銀

⁴ 鄭竹園，〈中共經濟改革與社會動亂〉，《神州悲劇的沉思》(台北：正中，1989)，頁 58-59。

⁵ 楊渡，《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台北：天下，1995)，頁 88-89。

⁶ 何頻、高新，《中共太子黨》(台北：時報，1992)，頁 39-53。

行和貿易公司，也很多此類所謂「太子黨」的成員擔任重要職位。⁷

中共不是不知「官倒」給人民印象如何，中共下令禁止以權經商，但卻越禁越多。「官倒」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央及各部委的，雖然禁止，但執法人員卻辦不下去，禁止變成「有禁不止」。我們可以說，「官倒」企業買賣的不是商品，而是權力。

「官倒」的原因來自雙軌制，而 1988 年的二次「闖物價關」，民眾預期物價上升，搶購的情況更為嚴重，更帶動了通貨膨脹，「官倒」的情形在這種背景之下更地讓民眾厭惡。

威權政體必須盡量地將群眾的要求局限在經濟議題，當這些群眾進行政治動員時，有了政治性的訴求，政權的能力將大幅減弱，合法性將被挑戰。通貨膨脹、物資短缺、官倒，這三個經濟現象錯綜交錯，是 1989 民運前的背景，學生訴求之一就是「反官倒」，將民主政治與反官倒、反腐敗掛勾，⁸是學運最能獲得北京市民認同的原因。如果只是單純地通貨膨脹、物資短缺，民眾或許還可以忍受，但看到已經先富起來的共黨幹部，在這種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反而是賺了更多錢，當然無法忍受。也因此 1989 年的群眾運動，在結合人民對經濟現象的不滿，規模十分龐大，也獲得很高的認同。

⁷ 鄭竹園，《大陸政經巨變與中國前途》(台北：五南，1992)，頁 32。

⁸ 李瑞騰編，《哭喊自由—天安門運動原始文件實錄》(台北：文訊，1989)，頁 152。

第三節 政治動員：1989 年大規模民運的發生

1978 年之後，中國大陸的自由化運動就一直在持續發展，很顯然地，中共希望以政治改革，適度的開放政治參與，以擴張中共統治的正當性，鞏固執政的基礎。但自由化運動被威權政府視為是一種有限度的開放，必須在中共的掌握之下，若是有組織的挑戰共產黨，將被鎮壓，例如民主牆運動，開始有串連的行動之後，中共即下重手鎮壓。⁹

但總的來說，自由化運動是在逐步發展的，可能以退一步、進兩步的方式前進，而在 1988 年中共經濟出問題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因為胡耀邦的逝世，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運動，群眾遊行表達對中共施政的不滿。

而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初期處理學運問題態度及策略上，並沒有明顯不同，但當情況失控後，兩派開始產生分歧，而鄧小平站在保守勢力的一方看學運，最後終至採取了鎮壓作為收場。

壹、初期：民運人士與改革派的互動

胡耀邦在 1989 年 4 月 15 日去世，民眾自發性的聚集悼念胡耀邦，並貼了大字報，由於當時共黨幹部腐化嚴重，民眾對共黨不滿的情緒相當高，因此在該場合喊了口號或寫大字報，抒發心中情緒，後來學生們在和維持秩序的武警發生衝突，以及求見共黨高層領導人的行動失敗，在學生的號召下，展開了示威遊行，要求中共從事政治改革，並徹底解決權貴子弟、共黨幹部投機倒把的問題。這時大學中出現的自主性反官方團體，也要求中共給予承認。

在天安門事件初期，學生喊出的口號是符合或稍微超出中共批准的愛國主義的口號，幾次大規模的遊行中，標語會刻意強調「擁護共產黨領導」，偶有一些

⁹ 劉勝驥，《北京之春》(台北：幼獅，1986)，頁 95-100。

亢奮的學生有擦槍走火的演出。但有組織的學生組織，大體是要求能進行體制內的改革，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確的，把自己定位成尊重和支持黨長期改革的位置。¹⁰

趙紫陽在初期則是錯盼了情勢，認為情況並不嚴重，雖然在學生衝擊新華門，並且和武警們發生流血衝突，還喊出一些類似「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是趙紫陽認為只要胡耀邦4月22日的悼念會過後，學生自會解散。趙紫陽在4月23日仍照原定計劃出使北韓，並指示以疏導為主，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沒料到事態嚴重。¹¹

但學生顯然不願收手，於4月23日晚成立了正式的組織，這就可被中共定位成有組織的暴動，並且情勢越演越烈，蔓延到全國各省。¹²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二六社論」，由鄧小平正式將學運定調為「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上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此社論警告人民不要參加學生行動，但適得其反，把學生定調為動亂、陰謀，不但使人民更加同情學生，也讓原本不知此事的人，透過人民日報的社論都知道了。¹³因此引發了4月27日的大遊行，由於遊行秩序井然有序，並獲得各界的同情，學生組織想乘勢追擊，開始籌備了五四的遊行，五四遊行後則發動了更激進的絕食。

趙紫陽於4月30日自北韓返國後，仍無法有效控制局面，並在5月4日亞行理事年會的談話中語重心長的跟學生表態，肯定學生的愛國之心，講了穩定的重要性。而在這談話定稿時，李鵬和趙紫陽已出現分歧。¹⁴

學生在此時由於人多火氣大，沒買趙紫陽的帳，加上探知趙紫陽的態度，不至於以武力鎮壓，於是得寸進尺不肯收手。李鐵映、閻明復一些態度較溫和的

¹⁰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6年），頁153。

¹¹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頁168-173。

¹²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頁61。

¹³ Ross Terrill，張連康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台北，絲路，1994），頁291。

¹⁴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頁258-315。

共產黨代表與學生對話，學生依舊強勢。後有學者代表戴晴、蘇曉康等自願擔任勸說的角色，也是吃力不討好，動輒被學生們說為政府的說客，來摸頭的。¹⁵

並且由於政府的克制，使得工人、新聞界、知識份子等團體敢群起支援學生，在5月17日，北京有120萬左右的群眾上街遊行，除學生外，還有各界團體的遊行隊伍，包括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九三學社、個體戶請願團、對外友協、商界聲援團、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宣武醫院、中國檢察報、中國人才報、中國青年雜誌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國體育報、中國物資報、中國煤炭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起重機廠、北京變壓電機廠、中國化工石油總公司、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首鋼工人聲援團、北京國棉二廠……等，族繁不及備載，甚至連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外貿部、衛生部、郵電部……等政府單位都參加了遊行，另外還有解放軍千餘人，參加抗議的群眾包括了工人、幹部、知識份子……，從這遊行隊伍來看，學生的帶頭，讓民眾們積蓄已久的不滿情緒發洩出來，對共產黨這幾年施政的不滿幾乎是全民共識。¹⁶

甚至於連新聞自由都被衝破，在趙紫陽的同意下，人民日報、新華社皆大幅報導民運，並給予正面評價，¹⁷中共的威權體制彷彿一夕間將被衝毀。

貳、轉變：鄧小平介入，趙紫陽失權

鄧小平當時基本上是處於垂簾聽政的角色，和東歐一些垮台的共產政權不一樣，鄧小平是革命的元老，不似東歐當時領導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擁有較高的聲望，鄧是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共主。

趙紫陽其溫和手段無法獲得學生的配合，反而群眾運動變本加厲，一些煽情鼓動的話語舉動不斷出現，如柴玲說：「如果這個沒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話，

¹⁵ 同前註，頁277-281。

¹⁶ 同前註，頁453-456。

¹⁷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台北：聯經，1990），頁157-158。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希望！」並且稱願意妥協的學生為「投降派」，這些激進的學生領袖占了優勢，不斷地宣傳鼓動成為他們可以成為領袖的權力基礎。¹⁸在那種情況下，英雄主義和個人主義極端的發展，使得場面失控，已經不是學生可以控制的住了。若連學生組織的領導人都被群眾熱情衝昏了頭，失去理性，不肯和黨內改革派合作，那情況只能以保守派鎮壓收尾了。

鄧小平在此時就作出決策，認為趙紫陽不但沒有有效地控制住場面，並且還使情況越來越壞，學生鬧的更兇，因此決定戒嚴，趙紫陽表示他不執行此命令，因而下台。以李鵬為首的保守派開始接掌處理學潮的事。¹⁹

5月18日清晨，趙紫陽和李鵬到醫院探視進行絕食而送醫的學生，北京仍然出現百餘萬人參加的大遊行，次日清晨，已經開會決定採鎮壓手段，趙紫陽已經準備要下台，開完會後，趙紫陽和李鵬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並試圖要求撤出天安門廣場，不明上層政治內情的學生拒絕了這項要求。他們雖然對趙紫陽給予肯定，但他們的行動正受到世界的注目，及不斷地有同情他們的市民，及港台、外國提供給他們的物資，在那種情緒之下要退的確是很難的。

也就在這一天，鄧小平決定採取鎮壓行動，趙紫陽已自己請辭，北京自5月19日起宣布戒嚴。

參、尾聲：保守派鎮壓天安門群眾

戒嚴令下達後，從全國各大軍區調來了二十幾萬軍隊，並開始進行佈署，但市民們有些設路障，有些在解放軍面前勸說，也有少部分激進市民和解放軍發生了零星的衝突。到了6月，事實上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民眾已經不是那麼多，但鄧小平下令是在6月4日清除所有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最後還是釀成了悲劇。就算依照中共官方的數據，只死亡200多人，受傷3000多人，但畢竟也還是採用

¹⁸ 卡瑪、高富貴等，《天安門》（香港：明鏡，1997），頁156-157。

¹⁹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頁440-533。

武力鎮壓了。

政權內部被保守派控制住，鄧小平站在保守派那邊，共產黨內沒有明顯地分裂，除了趙紫陽和胡啓立被解除職務外，其他人都支持鄧小平的決定，倖存的領導人把所有的過錯歸咎於趙紫陽。

而在戒嚴令宣布後，為何學生、群眾還看不出該退了？本文認為有幾個理由：(一)由於場面混亂，很多謠言助長了群眾的信心，諸如「徐向前說，誰向老百姓開槍，我把誰槍斃！」「萬里從加拿大來電，稱李鵬講話不符合憲法」……等。²⁰(二)部分學生領袖的英雄主義作祟。(三)低估了共產黨維護其政權的決心。

而共產黨為何在廣場人已漸漸散去的情況下出兵清場，本文認為是共產黨為表達他們絕不退讓的決心，殺雞儆猴，不讓群眾再有幻想的空間，彌補之前趙紫陽給群眾共產黨是會讓步的訊號，修補即將崩潰的大堤的縫隙，因此實施了強硬的手段，除武力清場外，亦有逮捕民運人士，封鎖新聞等措施。²¹事後證明這些措施有效地、成功地保持威權體制的存在。

²⁰ 同前註，頁 582-583。

²¹ 大衛·艾克敏等，《未完成的民主運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0年)，頁 235。

第四節 政權內部分裂：改革派的挫敗

在胡耀邦下台後的中共政局，基本上仍是鄧一人獨尊的情況，從和凡是派的鬥爭結束後，鄧小平就處於派系共主的角色，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扮演平衡的角色，而鄧本人的意志決定了經濟改革的幅度以及政治控制上的拿捏應是如何。

在胡耀邦下台後到天安門事件，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氣勢消漲大概有兩個轉折，到十三大之前，改革派的氣勢是走上坡的，到了十三大左右達到頂點，趙紫陽一上台就是尋求鄧的認同，結束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接著展開經改的各項措施，在十三大前後又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並且也有鄧的講話對抗保守派。當然趙紫陽與鄧小平所說的改革僅限於體制。十三大所宣示的政改項目包括(1)實行黨政分開；(2)進一步下放權力；(3)改革政府工作報告；(4)改革幹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6)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若干制度；(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²²

政改也是為了配合經改的配套，鄧小平曾於一次講話表示：「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同經濟體制改革相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²³由鄧的講話可知，政改是為了解決經改所遇到的障礙，如前所述，共黨幹部在經改下的風評很差，素行不良，而且還出現地方割據的現象，各省發展小而全的經濟型態，²⁴這些都是鄧認為經改出現「人的障礙」的問題。

因此鄧小平同意趙紫陽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但鄧對四個堅持，尤其堅持共產黨領導一項絕不容挑戰，這也是我們可以自鄧掌權以來可觀察到的。

但自此之後隨著經改造成的亂象加劇，原本支持價格改革的鄧小平也認為該

²²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87年11月4日，第1-4版。

²³ 凌志軍、馬立誠，《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台北：天下，1999），頁341。

²⁴ 鄭竹園，《大陸政經與中國前途》（台北：五南，1992），頁29-32。

讓步了，自 1988 年 9 月起由保守派掌控經濟政策，開始治理整頓，抑制經濟過熱，但又如同 1986 年下半年一樣，再一次的形成了經濟成長率趨緩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滯脹」情形，民怨四起。但在經濟過熱的情形下，這也是不得不的措施。

但在政治方面，就沒辦法如同總體經濟方面一樣，可以由政府使用擴張或緊縮政策來控制其總體變化，政治控制一旦放鬆只有越來越開放，保守派想逆轉已經被解放的人民意志，沒有像逆轉經濟過熱情形如此容易，儘管批判了「河殤」，但人民敢議論時政，敢批判共產黨腐化，並且將針對的對象從基層提升到中央領導人的趨勢卻是越來越明顯的。經過了開啓自由化以來的一段時間，共產黨已經不是讓人恐懼的組織。

而 1989 年民運期間，中共黨內初期的分裂不明顯，趙紫陽和李鵬都認為只是學生鬧鬧事，沒想到因為經濟社會亂象，讓事情越滾越大，到了不得不採用強硬手段時，兩派才有了意見分歧。趙紫陽認為群眾不是在挑戰共產黨的領導，他認為學生的要求是對話和要求黨解決問題，爲了撫平學生情緒，趙紫陽認為黨應該撤銷「四二六」由鄧小平定調的人民日報社論。但李鵬也有其邏輯思考，社論已經明確區分大多數與一小撮，再讓步只會讓學生要求越來越多，將嚴重的再次危害黨的威信。和平解決的代價和強硬手段的代價是他們意見不同之處，和平解決之後，對於政府權威和政治穩定要付出多少代價，是保守派的考量之處。而當不只學生，而是各界人士都參加遊行，包括了解放軍千餘人，鄧小平接受了保守的說法，站到保守派的一方，決定用強硬手段解決這次事件了。若他們讓步，不只學生團體，共產黨喪失的將是對社會的控制。

中國共產黨自 1978 年以來，中共執政合法性已經完全是建立在改革之上。人民對政權的恐懼應也是威權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之一，但是在 1989 年此時，人民對共黨政權已毫無懼意可言，一方面是由於人群聚集，幾百萬人都走上街頭，他們相信共產黨不至於鎮壓那麼多人聚集的示威遊行；另外，十年來的自由化，群眾依照其經驗，共黨面對示威遊行，頂多只是揮揮警棍，或是風波後再抓幾個

人殺雞儆猴，不至於開槍，尤其越到後期，政府處理此類事件的態度越寬鬆。但他們忽略了，1989年的民運，是會嚴重地侵蝕共黨統治合法性，示威群眾的規模及其廣泛，都是前所未有的，遊行隊伍中還出現了公家機關的代表，甚至有人民解放軍的軍人參與其中。

這種局勢逼迫鄧小平做出鎮壓的決策，以重建人民對共產黨的恐懼，「改革」的受挫，讓共產黨必須找出另一個合法性的存在。

而當時趙紫陽和胡啓立是反對用強硬手段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人或贊成，或是沒表達意見。鄧小平穩固的地位，讓趙紫陽和胡啓立的不同意見，只能以辭職，而不是以反抗收場。

第五節 小結：派系衝突與民主化的挫敗

Przeworski 認為，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後，威權政體將有兩個選擇，(1)深化改革，威權體制完全崩潰，民主化完成；(2)鎮壓反對運動，重回威權體制。²⁵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共以武力鎮壓的手段結束了這波自毛澤東之後開始的政治轉型。1989年時，自由化運動發展到使威權體制崩潰的臨界點，再往前一步，就是民主化，但很可惜的這一步沒有踏出去，反而是回到原點，威權體制重新鞏固。

壹、大規模群眾運動後，保守派掌握大局，威權體制重新鞏固

1989年最後會由保守派決定如何處理學運，在於改革派無法掌握住局面。自由化運動總是被改革派設想為可控制的施予，是擴大統治合法性的策略，改革派以這套說法跟保守派保證。趙紫陽及其智囊團鼓吹「新權威主義」，其論述中有「權威」二字，或許能讓保守派，尤其是鄧小平較為心安，但根據趙紫陽兩名策士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出，「新權威主義」本質上還是受政權控制的自由化運動。吳稼祥認為新權威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及中產階級的形成，強調領導人物和與其配合的決策集團，將可對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有所助益。²⁶蕭功秦則認為新權威主義在政治上藉強有力的官僚力量進行由上而下的統治，是作為不發達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當培育出強而有力的中產階級後，則應向民主過渡。²⁷

但群眾對自由化運動的看法，卻和體制內改革派是不一樣的，當群眾們感受到自由化的訊息後，總是會要求的比政權願意給予的更多，由於雙方的解讀不同，自由化運動最後總是變成(1)政權力量比群眾力量大，威權體制再次鞏固；(2)

²⁵ Adam Przeworski, 張光、馬俊峰譯,《民主與市場》(台北:桂冠,1998),頁74-77。

²⁶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原載世界經濟導報,1989年1月16日。收錄於齊魯編,《新權威主義》(台北:唐山,1991),頁4-8。

²⁷ 蕭功秦,〈痛苦的兩難抉擇—關於新權威主義理論問答錄〉,原載文匯報,1989年1月17日,收錄於齊魯編,《新權威主義》,頁13-19。

群眾力量比政權力量大，往民主化過渡。

在中國大陸，先是胡耀邦無法控制住 1986 年的學潮，1989 年的民運，失控的程度更是超乎趙紫陽的想像，改革派在政權內的地位急速下降。本文一再強調，鄧小平擁有最後的決策權，當趙紫陽無法在事件一開始掌控住全局，並且情勢越來越惡化，趙紫陽失去鄧的信任，鄧只能採用保守派的建議，以強硬的手法處理。

貳、鄧小平決定以恐懼重新建立統治正當性

天安門事件能否有不一樣的結局？本文認為，若從事後的觀察，由於鄧小平當時一言九鼎，黨政軍皆衷心服從於他，威權體制若非鄧本人想改變，是不可能改變的，阮銘認為鄧小平自掌權後，所建立的是「鄧小平帝國」，雖然是阮銘有點情緒性的命名，但鄧小平在共黨內部的地位，的確是沒有人可以挑戰的，雖然沒有如同毛澤東那樣至高無上，但不可否認的，他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是非常穩固的。因此群眾們一搏的機會，只能是期待鄧小平本人的讓步，而非趙紫陽或其他領導人的政變。

而民主化、政治深化改革的選項，如前文所說，以鄧小平當時的意志來說，是絕不可能選擇的。鄧小平雖堅持改革開放，但更堅持共產黨領導，因此接受了保守派的邏輯推演，必須以鎮壓重建共產黨權威。當改革改得民怨四起時，鄧暫時放棄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並且在改革無法再做為統治合法性基礎時，鄧只能選擇重建人民對共產黨的恐懼，來做為中共持續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威權政體只要喪失能力，且面對了社經危機，就很有可能崩潰。但中共儘管面對了經濟危機、大規模群眾動員，但明顯地，中國共產黨的能力還是在的，甚至還是比民間大很多，之前寬鬆的政治控制，是其由上而下的放開，而非其沒有能力控制民間社會，民間社會力量雖有成長，但相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仍是微不足道的。

本文認為，若群眾比較冷靜，沒有拖到六四武力鎮壓就全部撤場，可能趙紫陽一派可續留共產黨，但是短期內威權體制在當時仍不會有崩潰的危機，民主化也不會有所進展。且還是得看鄧小平的想法如何，才能決定趙紫陽一派的後續發展，有可能趙紫陽會和胡耀邦一樣，就此下野，沒有實質權力；但亦有可能因此次運動規模龐大，鄧小平將趙紫陽留住，以穩定民心，並繼續借重其經濟長才。當然前者的可能性還是較後者大了許多。

參、派系成員重疊程度高，政變難度高

從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的資料來看，鄧小平的威望在當時是很高的，改革派確實沒有將戒嚴翻盤的可能，但根據王丹本人的透露，我們可以得知，除《中國六四真相》所說趙紫陽及胡啓立外，中共黨內高層還是有人不同意戒嚴的，王丹表示徐向前曾經表達欲和他本人接觸的意願。但是王丹那時爲了和中共黨內派系鬥爭劃清界限，沒有和徐向前接觸。²⁸不過當時學生運動由於規模龐大且組織雜亂，並非只有王丹一個體系，中國科大的學生曾於5月21日前往聶榮臻和徐向前的住地，並獲得接見，得到了善意且溫和的回答。²⁹

但就算學生和徐向前見面，以鄧在中共內部的實力與威望及鄧個人的意志與意願，改革派要政變或是要鄧和學生妥協，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更因爲中共派系的性質，是錯綜複雜的人際網路所形成，³⁰鄧小平又是爲第二代領導人，和軍方的關係，或是老幹部和軍方的關係，淵源都很深，儘管軍方或老將，對戒嚴或強硬的手法有不同意見，但也不至於以兵變的手段來反對鄧小平的決策，更何況在經過鄧小平及老幹部們的疏通後，老將們也都接受了鄧小平的決策³¹；例如聶榮臻，他和胡耀邦是很好的朋友，對鄧小平將胡耀邦拉下台的

²⁸ 王丹於2004年4月7日，台灣年代電視台，接受台灣心聲節目訪談。

²⁹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頁597。

³⁰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 p. 37.

³¹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頁598。

作法一直持保留意見，但聶榮臻和鄧小平又有同鄉情誼與革命情感，鄧榕在她為鄧小平寫的傳記中寫到聶榮臻，「又是一個四川人，又是一個留法勤工儉學生，父親稱他為老兄。五十年代初剛到北京時，我們就住在聶伯伯家隔壁，我們小孩兒們一有空就跑到聶伯伯家要糖吃……。」³²可見由於中共派系重疊的現象，使得聶榮臻儘管不同意保守派的作法，但由於和鄧小平的情誼，也沒有明顯的動作來反對戒嚴。

而改革派作為鄧小平扶持起來的派系，且主要工作是在經濟方面，根本沒辦法喊得動軍方，因此幻想政變的發生是不切實際的。

肆、民間社會力量未能與黨內改革派結合，民主化過渡無望

過程途徑的民主化研究，認為政權內改革派與民間社會溫和派的合作，是順利民主化的關鍵。³³

首先，天安門事件時，黨內改革派實力不足，鄧小平仍具主導全局的能力，本文已強調多次。

但姑且不論黨內改革派勢力根本無法與鄧小平抗衡，學生運動的特色傾向於理想主義，常表現出語氣激昂、內容空泛，強調理想與拒絕妥協，³⁴並且當學生由於組織雜亂，一人一把號時，完全沒有和中共內部勢力互動的能力時，往民主化過渡的情形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當大陸的民主運動是由學生作為主體，而非工會或政黨來領導時，已註定民主化之路將走得艱辛。

³²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wrence Whitehea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4-35.

³³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台北：東大，1995)，頁 40。

³⁴ Donald K. Emmerson, *Students and Politics in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68), p. 415.